

Doi:10.11835/j.issn.1008-5831.jg.2026.01.001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韩文龙,张瑞生,朱俊熹.“中国人经济”的生成逻辑、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1):13-28. Doi:10.11835/j.issn.1008-5831.jg.2026.01.001.



Citation Format: Han Wenlong, Zhang Ruisheng, Zhu Junxi. The generation logic,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and practical path of the “Chinese People’s Economy” [J].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6(1): 13-28. Doi: 10.11835/j.issn.1008-5831.jg.2026.01.001.

“中国人经济”的生成逻辑、 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

韩文龙^a,张瑞生^a,朱俊熹^b

(西南财经大学 a. 经济学院; b. 金融学院, 四川 成都 611130)

摘要:“中国人经济”集中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和现代化观。“中国人经济”这一范畴根植于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与世界市场理论,其提出既是中国从“引进来”“走出去”到“走进去”“走上去”的阶段使然,又是以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新发展格局的实践必然,其对核算体系的重构深刻体现了国民财富增长的范式转换。“中国人经济”具有深厚的理论内涵,其以“人”这一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为发展主体,以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发展动力,以增进民生福祉和推动共同富裕为发展目的,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拓宽发展空间,以全球范围内国民财富的共创共享为发展导向,体现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深层次、系统性变革。“中国人经济”不是孤立发展的,“中国经济”是“中国人经济”的前提与支撑,“中国人经济”是“中国经济”的延伸与拓展,二者辩证统一于国民财富的全球创造与中国式现代化。面向“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主题,需要坚持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和产业链跨境布局、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稳步扩大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从创新动能、产业根基、价值空间、伙伴关系网络、体制机制等多维度探寻发展“中国人经济”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 中国人经济; 国民财富; 高水平对外开放; 高质量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F124; D6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5831(2026)01-0013-16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下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创新与发展对策研究”(24JZD006)

作者简介: 韩文龙,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张瑞生,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朱俊熹(通信作者),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Email:lszjx@sina.com。

引言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并将“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列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此后中共中央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会上提出“我们既看GDP也看GNI,既重视‘中国经济’也重视‘中国人经济’”。面向“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主题,既重视“中国经济”也重视“中国人经济”,将发展视阈由国内生产拓展至全球范围内国民财富创造,高度契合了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发展观和现代化观,体现了经济发展模式从物质积累、规模扩张向财富创造、质效提升的深刻转换。

“中国人经济”是面向“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提出的一个重要范畴,代表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形态,具有独特而丰富的概念内涵。概括而言,“中国人经济”是以“中国人”为核心发展主体,突破地域边界限制,更注重全球范围内国民财富创造和资源配置能力的一种经济新形态。在衡量上,“中国人经济”以GNI(国民总收入)的增长为核心指标,与侧重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中国经济”共同构成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体两面。“中国人经济”并非脱离“中国经济”孤立存在的,其发展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以及丰富人才资源优势为基础,并依托中国国民和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投资经营活动实现中国经济外延的全球化拓展,是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开放的重要表现。

新时代以来,中国国民和中国企业在全球舞台上日益活跃,中国人在全球经济体系和创新版图的声音越来越受到世界关注,“中国人经济”的动力、活力、潜力愈加彰显。《2024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24年,中国共在全球190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境外企业5.2万家,覆盖全球超过80%的国家和地区,年末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9万亿美元,其中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设立的境外企业达1.9万家。2012—2024年间,中国在投资所在国家或地区累计缴纳各种税金达6600亿美元,年均解决超200万个就业岗位,“中国人经济”的全球互利共赢效果日益显著。可以说,“中国人经济”在全球的蓬勃发展,不仅为中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了新动能,而且让全世界共享中国发展红利,帮助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迈向现代化,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中国贡献。

“十五五”时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国经济迎来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在此背景下,发展“中国人经济”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的重要举措。“中国人经济”的提出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再审视,实现了发展主体、发展动力、发展目的、发展空间、发展导向等多个维度的系统性重构。对于这一创新性的话语表达,有必要从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做进一步的研究。基于此,本文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紧扣“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主题,对“中国人经济”的生成逻辑、理论内涵、关系辨析、实践路径等进行了系统性、学理化阐释,力图为“十五五”时期拓宽“中国人经济”发展空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

一、“中国人经济”的生成逻辑

“中国人经济”的提出,既是中国发展阶段转变的使然,又是中国发展模式转换的必然。“中国人经济”将发展视阈从国内转向全球、由物质生产转向财富创造,是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与世界市场

理论在当今全球化浪潮下的新理论诠释。发展“中国人经济”需要打破“唯GDP论”,推动核算体系调整变革,进而驱动国民财富增长的范式转换。

(一)历史逻辑:从“引进来”“走出去”到“走进去”“走上去”的阶段使然

改革开放前,受外部环境制约和相对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中国与外部经济体的联系非常有限。1978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仅占世界总贸易额的0.78%,基本处于全球贸易体系的边缘,亟需融入全球经济构建开放型经济。

1978年到1991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步期,“引进来”是这一时期对外开放的主要特征。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要素禀赋呈现劳动力充足、资本和技术要素极为短缺的失衡状态。1980年中国劳动力占世界劳动力总量的比重高达22.4%,而投资的比重则仅为2%,研发投入更是仅占0.5%。面对这一现状,中国亟需以劳动力优势,引进国外资本和技术,以填补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储蓄与外汇“双缺口”。这一时期,中国以市场换资本“引进来”一批餐饮、轻纺、汽车等领域的制造业企业,有效带动了国内聚焦初级消费需求的轻工业快速发展,同时出口商品也呈现典型的劳动密集型特征。

1992年至2000年,外商投资进入高速增长期,同时国内产业竞争力提升,中国在高质量“引进来”的同时,开始探索如何有组织地“走出去”。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为改革开放明确了方向,此后党的十四大、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等重大会议进一步推动了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吸引了外资的加速进入,至2000年连续7年成为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除了深化“引进来”外,如何有组织地“走出去”也成为这一时期对外开放的焦点。1997年,江泽民同志在会见全国外资工作会议代表时就提出,“引进来”和“走出去”是我们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两个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方面,缺一不可。2000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明确要实施“走出去”战略,努力在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方面有新的突破。

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进入全面对外开放新阶段。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中国制定、修订、废止了大量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为与多边规则相容创造了制度前提。开放政策体系的完善大幅降低了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扩大了外资的市场准入,大量世界500强企业进入中国,提高了“引进来”的外资质量。同时,引进外企类型从初级加工装配向电子信息、高端制造等领域延伸,推动了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入世还使中国企业更直接地参与国际竞争,推动了国内企业技术创新追赶与管理模式国际化,一批国内企业在细分领域初步具备了与大型跨国企业同台竞争的能力。在国内产业健康发展的有力推动下,“走出去”战略同步深化,境外企业设立数量和境外项目投资规模稳定增长,以中国企业为主体的跨境并购活动日益活跃,中国企业逐渐走出国门、融入全球。

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进入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构建与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要素禀赋和开放格局的新变化对中国参与全球分工的深度、广度和节奏提出了新要求^[1]。这一时期,中国在坚持高质量“引进来”的同时,“走出去”战略进一步向“走进去”“走上去”跃升。“走进去”即与国际市场深度融合,表现为与国际市场规则体系、贸易投资地价值文化的主动适应。“走进去”标志着中国从被动参与全球分工转向主动整合全球创新资源、构建稳定伙伴关系和韧性供应链。“走上去”则更强调中国向价值链中高端的攀升。在生产环节上,中国过去长期以OEM(原始设备制造)和ODM(原始设计制造)的模式参与全球贸易,新时代以来则更聚焦OBM(原始品牌制造),推动了出海企业从“代工”“贴牌”向“原创品牌”的突破。在贸易结构上,以“老三样”为代表的传统消费品焕发新生机,同时“新三样”等加速释放新动能。通过“走进去”和“走上去”

的协同推进,中国实现了从“贸易型出海”向“生态型出海”的转变,中国企业和国民在全球范围的活动日益活跃。

面向“十五五”,中国在关键技术、关键产业、关键领域已经逐步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跨越式发展,为未来一段时期发展“中国人经济”创造了坚实的硬基础和良好的软环境。具体而言,一是构建了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提升了中国企业海外产能建设的能力,为“中国人经济”的全球落地提供了物质支撑。二是积累了技术创新与品牌运营经验,实现了从模仿跟随到自主创新的跨越,打造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自主品牌,使“中国人经济”更具生命力。三是形成了全球化布局的合作网络,构建了更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开放环境。四是培育了大量的的高素质国际化人才,强化了中国国民在全球范围内创造财富的能力。

(二)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与世界市场理论的现实表征

“中国人经济”超越了传统“中国经济”的地域局限,聚焦于“中国人”这一主体,实现了发展视阈的全球拓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经济实践中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首先,“中国人经济”强调经济发展主体从“物本”到“人本”的转换,深刻体现了马克思关于“人”的价值、实践与发展等维度的基本认识,是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在新时代新征程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始终将“人”置于社会变革的核心地位,认为历史本质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从人的价值维度看,人是社会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更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相较于“中国经济”,“中国人经济”更加凸显“人”在经济发展中的创造性、能动性和目的性,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和“以人民为中心”这一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执政理念。从人的实践维度看,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人们通过生产劳动、科学实验等具体实践不断推动社会进步和自身发展。同时,人的实践具有鲜明的社会历史性,人的发展必然要与特定历史阶段的生产方式和社会条件相适应。随着中国国民在全球的活动日益活跃,需要高度重视并充分激发中国国民在世界范围内的创造性实践,从而在“再全球化”浪潮中牢牢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从人的发展维度看,在马克思所构想的人的联合体中,“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中国人经济”将发展的标尺从生产规模转向国民财富,是“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生动体现。

其次,“中国人经济”体现了经济发展视阈从“国内”到“全球”的拓展,强调了国内市场与世界市场的有机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市场理论在当前全球化趋势下的创新发展。世界市场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在世界市场上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必须正视的是,当今经济全球化仍以发达国家为主导,这种主导性不仅表现为发达国家在金融、贸易等领域的领先优势,还表现为发达国家对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权。马克思在分析世界市场的形成时剖析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剥削性:一方面使国家丧失了独立性,“分工的规模已使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3]627};另一方面使后发国家从属于发达国家,“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4]。以依附理论为代表的左翼现代化理论也以“中心—外围”体系描绘了二战后的全球格局。在这一体系的控制下,一些国家选择与世界市场“脱钩”,另一些国家则不得不“依附”于发达国家,鲜有后发国家能实现独立自主的现代化。

最后,“中国人经济”将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与世界市场理论有机结合,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

深入阐述,助力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2021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应对世界变局和破解人类难题,接续提出并推动落实一系列全球性倡议。从全球发展倡议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到全球安全倡议的“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再到全球文明倡议的“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最后到全球治理倡议的“倡导以人为本”,无不体现着坚定的人民立场与广阔的全球视野。“中国人经济”既要求深度参与国际分工,又强调了“中国人”这一发展主体,既实现了自身的高质量发展,又兼顾全球发展,为东道国创造了就业与增长机遇,从根本上有别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剥削本质。可以说,相比于西方国家的所谓“现代化=西方化”话语体系,“中国人经济”为后发国家如何在融入世界市场的同时保持独立性提供了新思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三)实践逻辑:以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新发展格局的实践必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对外开放,而是如何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发展的内外联动性。”^[5]推进新发展格局,必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着力提高对外开放质量,增强内外发展的联动性。新征程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要摆脱以往的要素流动型开放模式,转为构建以制度型开放为核心的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开放格局。在此语境下,对外开放的质量也要求从规模扩张转向质效提升,并更加强调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循环的联动性^[6]。

“十五五”时期,中国发展环境面临更加深刻复杂的变化,发展“中国人经济”是应对变局开拓新局,以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新发展格局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外依存度从1978年的不足10%迅速攀升,至2008年金融危机前达到了60%~70%的峰值,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发挥了我国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加强了国内国际的互动关系,但也增大了受国际市场冲击的风险^[7]。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外部需求受到巨大冲击,过度依赖国际市场导致的内需与外需不平衡、消费与投资不协调的问题凸显。以金融危机为转折点,中国更加重视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循环的协同,近年来对外依存度已逐渐回落至约30%的水平。根据商务部数据,截至2025年7月,中国按实际购买力计算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已经是美国的1.6倍。外需与内需的此消彼长、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必然要求将发展“中国人经济”置于更核心的地位。

“中国人经济”将发展视阈拓展至全球,是衔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纽带。一方面,“中国人经济”从供需两侧为畅通国内大循环注入新动力,进一步夯实了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在供给侧,海外华人已经成为全球知识更新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例如在人工智能领域,斯坦福大学的《人工智能指数报告》显示,全球顶尖人工智能研究人员中,中国籍专家的比例高达47%,远超欧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人经济”能够更好地发挥海外华人的桥梁作用,更高效地引进全球前沿技术和先进经验,为国内关键核心科技突围和产业转型升级积蓄创新势能。在需求侧,中国人的足迹已经遍布全球,同时也将中国文化符号、中国品牌IP推广到了全世界。海关总署数据显示,近年来国货“潮品”已经成为中国外贸的新亮点,2025年前三季度中国出口的节日用品、玩偶等超过500亿元,销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背后依托的是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中国企业的创新力、中国制造的硬实力。另一方面,发展“中国人经济”为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创造了条件。基于共同的民族认同、文化基因和语言背景,华人群体天然具有更高的信任基础和凝聚力,这种情感和文化纽带能够有效打破国际贸易投资中的信息壁垒,降低交易成本。在全球供应链加速重构的复杂环境下,发展“中国人经济”有助于增强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韧性和安全水平。

(四) 现实逻辑: GDP与GNI并重体现了国民财富增长的范式转换

既重视“中国经济”也重视“中国人经济”,在核算体系中表现为既看GDP也看GNI。GDP与GNI的区别与联系,可以从基本概念、核算视角、应用场景等方面进行辨析。首先是基本概念。根据国家统计局标准,GDP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等于所有常住单位创造的增加值之和;GNI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收入初次分配的最终结果,等于所有常住单位的初次分配收入之和。在1993年前GNP也被称为国民生产总值,但从其概念看它本质上是一个收入衡量指标,所以1993年国民经济核算国际标准将其改称为国民总收入GNI。其次是核算视角。GDP是从生产角度出发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总量,统计原则是地域原则;GNI是从初次分配的视角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常住居民的要素收入总和,统计原则是国民原则。GDP是核算GNI的基础,GNI等于GDP加上来自国外的初次分配收入净额。最后是应用场景。GDP反映了一个经济体的本土生产能力,GNI反映了国民收入获取能力和财富创造水平。二者都是分析各国经济状况的重要指标,当分析各国国内的经济增长、产业发展、区域经济时更关注GDP,分析各国的国民福利、收入分配、财富积累时更关注GNI。

GDP与GNI并重能够更全面系统地认识一个经济体发展的速度与质量。图1展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与GNI的增长趋势,可以发现二者始终保持持续增长态势,相对差值较小,这表明中国要素跨境流动带来的收入差异始终控制在较为合理的区间。在改革开放早期,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较低,外资在华收益与中国要素海外收益规模有限,GDP与GNI均处于较低水平。随着对外依存度的提升,近年来GDP基本保持高于GNI的趋势,本国居民海外要素收入低于外国居民在华要素收入。从中国对外开放的阶段性看,中国首先通过“引进来”吸引了全球要素,在吸收借鉴的基础上实现了国内产业体系的发展壮大,本土生产能力的提升进一步为“走出去”创造基础,因此“走出去”的起步晚于“引进来”,这就使得中国“走出去”的要素收益尚不能覆盖“引进来”的要素收益。随着“中国人经济”的发展,中国国民在海外的要素收入将会进一步提升,使GDP与GNI更趋均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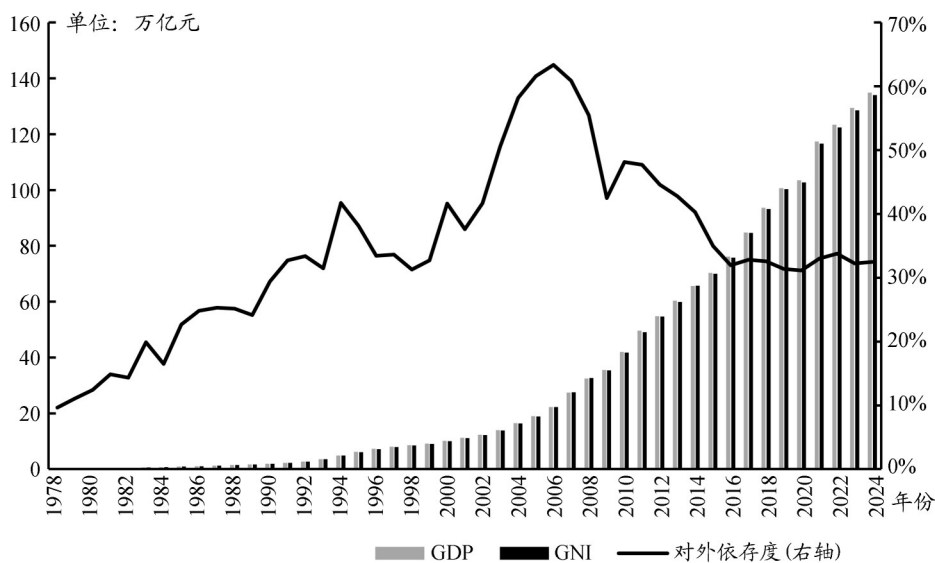


图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与GNI的关系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从全球各国发展实践看,GDP与GNI的差异,深刻反映了一个国家财富增长的基本范式。图2展示了近年来不同国家的GDP与GNI比值的变动(以现价美元计)。美、中、德作为世界GDP排名前三的国家,GDP与GNI的比值基本围绕1上下小幅波动,体现了经济大国应有的跨境要素流动均衡性。这些国家国内都有较强的生产体系,同时通过跨境投资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占据着重要位置,要素双向流动较为均衡。日本的GDP与GNI比值则长期低于1,2022年更是降至0.8以下的水平。由于国内经济增长乏力、人口老龄化严重,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后大规模进行对外投资,海外净资产连续30多年居全球之首。但这种过度依赖海外经济的增长范式也存在一系列问题,大量海外利润滞留境外用于再投资,未能有效回流以支撑本土建设和经济发展,“产业出海”加剧了资本、劳动力的进一步外流。以新加坡为代表的外贸驱动型国家则相反,GDP与GNI的比值长期高于1。这类国家借助于全球金融、航运等优势地位,吸引了大量国际资本和劳动力,但这种发展模式在面对外部冲击时,其韧性不足的问题也会逐渐显现。总体而言,GDP与GNI的差异反映了一个经济体的发展模式,特别是对于经济大国而言,需要平衡好内循环与外循环的关系,使GDP与GNI的差异维持在合理范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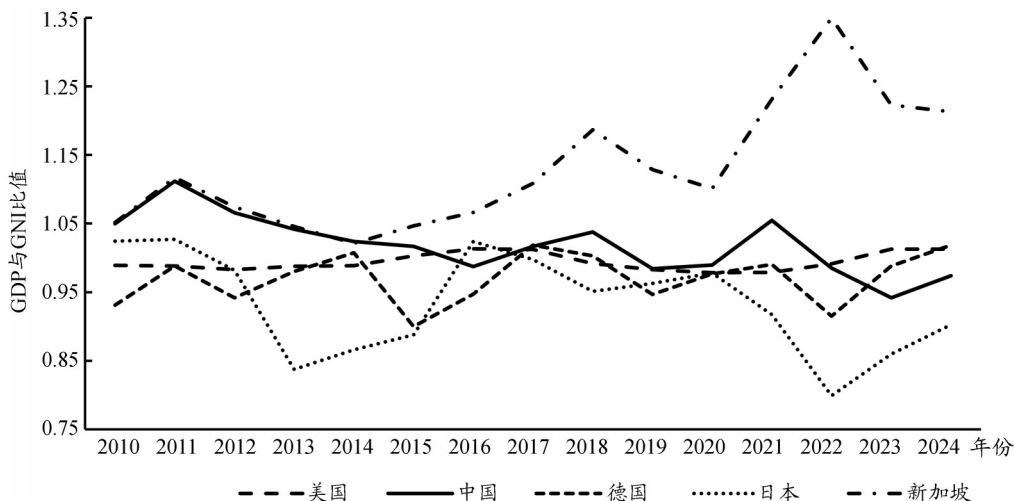


图2 不同国家的GDP与GNI比值变动及比较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二、“中国人经济”的理论内涵

“中国人经济”意蕴深厚,需要从发展主体、发展动力、发展目的、发展空间、发展导向等多个维度进行理论凝练与阐释。“中国人经济”更关注“人”这一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是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的重要体现,其以增进民生福祉和推动共同富裕为发展目的,通过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增强对全球资源的配置能力,最终以全球范围内国民财富的共创共享为发展导向。

(一)以“人”这一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为发展主体

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标志着人类改造自然的实际能力和水平,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生产力由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个基本要素构成,其中劳动者是具有一定生产经验、劳动技能和科学知识的从事生产活动

的人,是生产力中最重要、最活跃的因素。马克思在考察劳动过程时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8]劳动过程就是劳动者运用劳动资料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从而生产使用价值的过程。从这一意义而言,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只有与劳动者的活动相结合才能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当劳动者不断提高自己的教育与技能水平时,就能更高效地利用劳动资料从而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同时,劳动者还能通过自身的劳动实践不断改进劳动资料、拓展劳动对象。因此,生产力中“人”的核心地位,既体现在其在生产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又表现为其对生产力要素质效跃升的推动作用。

生产力的三个基本要素相互联系,通过分工、协作等方式,按照一定的结构组成了生产力系统。随着生产力质态的跃升,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转换,科技、管理等渗透性要素加速渗透到生产力基本要素中,并使实际生产能力突破线性增长模式实现指数式增长^[9]。这些渗透性要素在生产力系统中的地位更加凸显,归根结底是“人”的劳动实践的结果。

“中国人经济”是以“人”为核心发展主体的经济形态,体现了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中国人经济”不仅更重视“人”在生产力系统中的核心地位,将中国国民的劳动实践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而且着眼于国民财富的积累与民生福祉的提高,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活动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从全球竞争的高度看,国家竞争的本质是人才竞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充分激发中国人民的创造力。在实践中发展“中国人经济”,需要坚持教育强国、人才强国战略,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深度转变,才能助力中国经济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真正从“走出去”转向“走进去”“走上去”,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创新动能。

(二)以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发展动力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深刻重构全球经济体系和创新版图,世界各国纷纷加快创新战略布局,力争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制高点,例如美国的“先进制造业国家”、德国的“工业4.0”、日本的“社会5.0”等。在此背景下,中国发展“中国人经济”必须牢牢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在全球产业竞争格局中占据更为核心的位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廉价优质的要素供给优势,逐步形成了以货物贸易为核心的传统国际竞争优势。随着全球生产体系的深刻调整,叠加国内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内在要求,传统的国际竞争优势在持续衰减。发达国家遏制中国发展引发的产业转移效应,进一步削弱了中国参与全球分工的比较优势。但与此同时,中国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教育普及带来的人才红利正逐步释放,为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创造了有利条件。

创新是一个系统性工程,不仅包括科技创新,还包括产品创新、品牌创新、产业组织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多种形态。发展“中国人经济”的核心动力是实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演化经济学家佩雷斯提出了“技术—经济范式”理论,为理解技术扩散、产业周期和范式变迁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在一轮技术革命中,颠覆性技术的大规模产业化会影响产业结构、组织模式、经济制度、社会理念等一系列社会规则,这些社会规则共同构成了一套技术—经济范式^[10]。佩雷斯将一次技术革命周期划分为四个阶段:在爆发期,具有颠覆性的新技术对传统技术体系实现“创造性破坏”,新产品、新产业不断涌现;在狂热期,技术创新与产业创新加速融合,新的技术体系快速扩张并发挥锁定效应,同时推动制度的适应性调整;在协同期,新范式充分展开,技术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新产业持续增长;在成熟期,产业接近成熟,市场趋近饱和,技术创新由突破性创新变为渐进

性创新,开始为下一段范式突破积蓄动力。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基本遵循上述技术革命周期的一般规律。从改革开放初期至20世纪90年代,中国通过“引进来”主动对接全球先进技术与广阔市场,劳动密集型产业快速发展并变革了传统的以农业和重工业为主的产业体系。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制造业迎来爆发式增长,信息技术的普及应用推动了电子商务、数字平台等新业态兴起,新的技术—经济范式逐步形成并充分发挥作用。新时代以来,技术创新逐步转向自主创新,并加速与产业领域创新深度融合,推动了高铁、5G、新能源等产业的发展壮大。面向“十五五”时期,中国在一些产业的发展已经接近成熟,钢铁、水泥等传统产业,以及光伏等新产业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经济发展的范式亟待转换。因此,从技术—经济范式理论看,中国从侧重“中国经济”转向既重视“中国经济”又重视“中国人经济”、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不仅是一次评价体系的科学更新,更是一场牵涉发展理念、发展动力、发展目的等诸多方面的深刻变革,背后体现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技术—经济范式的阶段性更迭,其核心动力与重要表现就是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

(三)以增进民生福祉和推动共同富裕为发展目的

发展“中国人经济”,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紧密结合的重要举措。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GDP在2010年超过日本后一直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从人均看与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在全球的排名将升至70位左右,较21世纪初已经实现了大幅上升,但与中国GDP总量的全球排名相比仍差距显著。正是基于这一现实背景,党中央在概括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特征时,将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置于首要位置。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演进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总体上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对医疗、教育、环境、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马克思指出,“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3]531}。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发展“中国人经济”,归根结底是满足中国人民群众对更高层次和更全面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现实诉求。

发展“中国人经济”不仅体现为国民财富规模的增长,还蕴含着发展成果普惠共享的价值导向,是增进民生福祉和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随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持续攀升,境外投资主体的利润回流规模也同步实现增长,既为国内产业升级注入核心动能,也有效提升了中国居民收入水平。除了直接的经济效益外,境外投资还推动了全球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运营模式回流国内,进一步通过产业辐射效应惠及更多群体。例如在智能制造领域,2016—2022年间美的集团分步收购德国库卡集团股权并实现100%控股,通过消化吸收库卡先进技术和研发体系积极拓展机器人相关新业务,至2025年前三个季度机器人与自动化业务实现营收226亿元,成功实现了机器人领域的“弯道超车”。这类产业升级释放的红利进一步传导至产业链上下游,带动配套产业集群发展,创造了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使不同群体都能依托产业发展实现增收。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也是共同富裕的关键抓手。从全球范围看,中国企业分布在全球的生产基地、研发中心等为中国及投资东道国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可以说,发展“中国人经济”,不仅夯实了民生福祉的产业基础,更搭建起惠及中国国民乃至世界人民的财富增长平台。

(四)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拓宽发展空间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表明,各国生产自身具有相对效率优势或要素禀赋丰裕的产品,能够通过交换弥补稀缺性资源短板,从而提升整体经济福利。中国虽然要素总量多,但人均要素占有量不足,部分关键资源存在结构性稀缺,特别是在原油、铁矿等基础自然资源和芯片、计算机和通信设备等高技术产品上仍存在较大缺口,这就需要积极融入国际市场获取更多元化的资源。

然而,盲目依循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也可能导致一个经济体陷入“资源诅咒”和“低端锁定”。中国积极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仅是基于资源禀赋互补的考量,更是着眼于增强国际竞争力以推动价值链地位的攀升^[11]。从“动态比较优势”的角度看,比较优势可以通过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来实现动态转换和能级提升。中国在过去通过劳动力成本优势融入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并逐渐积累资本与技术跻身价值链中高端,同时通过长期的教育普及和民生投入使低成本的劳动力供给转换为高素质的人才资源,此时中国比较优势就成功升级为创新优势,劳动者成为新比较优势的创造者与受益者。

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其长远目标在于增强对全球资源的配置能力,这也正是发展“中国人经济”的题中之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是在全球范围内控制、集聚、整合、分配各类要素资源的能力,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是发展中国家深度参与全球化的重要契机。从全球生产网络关键枢纽的地理分布看,纽约、伦敦、新加坡等具有全球要素影响力的城市都对关键战略性资源或战略性通道拥有强控制力,从而拥有跨国界、全球性的要素控制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增强资源配置能力,提高对资金、信息、技术、人才、货物等要素配置的全球性影响力。”^[12]当前,创新资本、关键资源、先进技术、拔尖人才等高端资源已经成为各个国家争夺的焦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也正在推动先进制造业回归,以增强在高端技术、要素、产业等方面的控制力。面对这一挑战,中国必须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增强对全球高端创新资源的牵引、吸纳与配置能力,为“中国人经济”增添新活力、拓展新空间。

(五)以全球范围内国民财富的共创共享为发展导向

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增强了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国民财富创造能力,为“中国人经济”创造了新的增长空间。从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与存量看,202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连续9年占全球份额超过一成,存量则连续8年排名全球前三,境外企业覆盖全球超过80%的国家和地区。从中国“企业出海”的规模及财富创造情况看,2024年约三分之二的A股上市公司开拓了海外业务,海外营收突破10万亿元,较10年前增长2.8倍,海外业务毛利润达到1.63万亿元,较十年前增长8.33倍。海外业务毛利占比达到14.71%,首次超过海外营收占比,是中国企业全球竞争力提升的重要体现,也是中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的重要标志。

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借助“中心—外围”体系攫取全球财富不同,中国发展“中国人经济”是以全球范围内国民财富的共创共享为导向的,这从根本上有别于西方国家“优胜劣汰”的发展观。西方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进程本质上就是一部武力侵略和经济掠夺的历史^[13]。不管是早期的帝国主义殖民掠夺还是当下的金融霸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始终通过军事与金融等手段实现对全球资源和市场的不平等掠夺,其全球化“繁荣”的假象始终以发展中国家的贫困、衰弱和动荡为代价。资本的扩张性和掠夺性决定了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必然伴随暴力与剥削,只有打破西方的武力霸权和

规则垄断,建立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新型全球化秩序,才能让全球化真正服务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指出:“1950年至2016年,中国在自身长期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不高的情况下,累计对外提供援助款4 000多亿元人民币,实施各类援外项目5 000多个,其中成套项目近3 000个,举办11 000多期培训班,为发展中国家在华培训各类人员26万多名。”^[14]这一系列数字表明,中国参与全球化不是秉承的“零和博弈”思维,而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谋求的是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特别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强大,过去只能被动接受国际规则的情况有所改变,中国正在越来越深刻地影响和塑造世界经济秩序,在发展“中国人经济”时应当更多地承担起国际社会的期待和大国应担的责任^[15]。

三、“中国经济”与“中国人经济”的辩证统一关系

“中国人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新经济形态,其发展不是孤立存在的。“中国经济”是“中国人经济”的前提与支撑,“中国人经济”是“中国经济”的延伸与拓展,二者推动实现了国内国际技术、要素、产业的协同,并辩证统一于国民财富的全球创造与中国式现代化。

(一)“中国经济”是“中国人经济”的前提与支撑

大国经济以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为基本特征。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曾指出,“中国幅员是那么广大,居民是那么多,气候是各种各样,因此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产物,各省间的交通,大部分又是极其便利,所以单单这个广大国内市场,就够支持很大的制造业”,“假设能在国内市场之外,再加上世界其余各地的国外市场,那么广大的国外贸易,必能大大增加中国制造品,大大改进其制造业的生产力”^[16]。建立现代国民收入核算体系、被誉为“美国GNP之父”的库兹涅茨也关注到不同类型国家在发展模式选择上的巨大差异,认为对于大国来说,国内市场及资源条件允许其发展专业化和规模经济。从这些学者的观点看,大国经济发展模式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大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自然资源丰富且多样化,其资源禀赋能够支撑起以内部经济为主的发展模式;第二,大国庞大的市场和多元化资源允许更深层次的分工程度和更规模化的产业组织,这些特质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第三,大国经济发展同样需要参与世界市场,更广泛的国际贸易有助于提高商品质量和生产力。

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既符合大国经济发展的一般特征,又体现了其独特的发展阶段和禀赋特质。一方面,中国拥有超大规模且极具增长潜力的市场,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随着中国居民收入的提升,未来十多年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将超过8亿,由此形成的高品质、多元化消费需求构成全球最具潜力的市场之一。另一方面,中国作为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能够实现大部分产品的自主生产和供需匹配,为“中国人经济”提供了坚实的产业基础^[17]。从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动看,“中国经济”能否行稳致远,决定了“中国人经济”的发展质量与发展边界。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必须依靠强大的国内市场,扩大内需、畅通内部循环,形成供给更高质量、内需更具活力的高水平动态平衡,不断优化提升“中国经济”的体量、结构与韧性,筑牢发展“中国人经济”的物质前提与产业支撑^[18]。

(二)“中国人经济”是“中国经济”的延伸与拓展

“中国人经济”突破了地域局限,聚焦于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了“中国经济”的范围延伸与内涵拓展。在范围边界上,“中国经济”着眼于国内市场、本土产业、境内资源要素,其经济活动主要集中于

地理维度上的中国领土;而“中国人经济”则突破了地理边界,以“中国人”在全球的活动轨迹为经济辐射范围,将境外中国人的跨境投资、生产经营等经济行为纳入经济范畴,实现了从“物本导向”向“人本导向”的转向。在内涵本质上,“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国内生产总值等总量指标为核心衡量,更加重视物质资本积累与经济规模扩张,是中国经济实力和竞争力的直接体现;而“中国人经济”则是在“中国经济”的总量基础上,更加聚焦国民财富创造与民生福祉提升,是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体现。需要指出,“中国人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进阶形态,发展“中国人经济”绝不是要舍弃“中国经济”。没有“中国经济”奠定的生产力基础,就没有“中国人经济”的健康发展。

“中国人经济”使中国全球资产配置更加多元化,提高了对全球要素资源的掌控力,能够提升“中国经济”在面临国际供应链波动冲击时的韧性。单纯重视国内生产总值的发展模式容易形成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在面临国际供应链断裂、贸易保护主义等外部冲击时就会对国家经济安全造成较大危害。“中国人经济”强调国民财富的全球创造,引导企业与资本优化全球投资布局,构建从能源、矿产等基础资源到芯片、操作系统等高技术产品的分布式供应链。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分布看,中国在全球的资产配置呈现显著的多元化趋势。2024年中国对东盟、拉丁美洲、欧洲、大洋洲投资分别增长了36.8%、15.4%、25.3%和113.7%,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增长22.9%,占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26.5%。这种更具韧性的投资分布一方面分散了全球风险冲击,另一方面强化了我国对全球要素资源的掌控力,显著提升了中国经济的发展韧性。

(三)二者辩证统一于国民财富的全球创造与中国式现代化

从核算角度看,“中国经济”与“中国人经济”存在一定的联动关系。如果更侧重发展“中国经济”而忽视“中国人经济”,净要素收入则为负值,反之则为正值。当“中国经济”与“中国人经济”的发展出现失衡时,净要素收入也会出现过大或过小的状态,从而扭曲国民储蓄与投资。由于经常账户余额是净出口、净要素收入和净经常转移之和,因此这种失衡会进一步影响国际收支平衡。

“中国经济”与“中国人经济”实现了国内国际技术、要素、产业的协同,辩证统一于国民财富的全球创造与中国式现代化。在技术维度上,新一轮科技革命下的技术突破具备非线性特征,这种特性决定了“闭门造车”的封闭式创新模式难以支撑技术迭代的需求^[19]。发展“中国经济”与“中国人经济”,能够推动国内技术研发与全球技术吸纳形成良性循环,一方面通过新型举国体制构建关键核心技术协同攻关体系,另一方面以中国国民、中方企业为桥梁追踪全球技术前沿,打破技术创新的地域壁垒,从而增强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动能。在要素维度上,财富创造和中国式现代化都需要多元化的优质要素供给,而单纯依赖本土要素难以在长期内实现国民财富的持续增长。发展“中国人经济”能够突破单一地域的要素供给局限,发挥内部要素的基础保障功能与全球要素的互补赋能功能,从而构建内外互补的要素体系,拓宽国民财富创造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在产业维度上,当前全球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在跨国公司的主导下,全球生产网络将产品价值链分解为独立模块并进行全球化分配^[20]。通过深度嵌入全球生产网络,能够发挥中国完整工业体系强大的生产能力,同时以发展“中国人经济”优化全球产业布局,在全球价值链中向高端环节攀升。通过产业体系的协同联动,既为国民财富的全球创造提供了产业载体,又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了物质技术基础。

四、“十五五”时期发展“中国人经济”的实践路径

发展“中国人经济”是“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需要围绕发展“中国人经济”的创新动能、产业根基、价值空间、伙伴关系网络、体制机制等维度探寻相关实践路径,助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

(一)坚持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增强发展“中国人经济”的创新动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人口高质量发展同人民高品质生活紧密结合起来,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21]。坚持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是“十五五”时期发展“中国人经济”的重要路径。

从发展经济学视角看,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和城镇化早期,由于存在着经济恶性循环,容易陷入“贫困陷阱”而难以摆脱。这种“贫困陷阱”一方面表现为规模不经济的低技术均衡状态,另一方面表现为人均收入停滞和人口膨胀。为了避免落入“贫困陷阱”,在发展前期必然要“投资于物”形成规模效应,以推动物质生产能力提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实践也主要围绕物质资本积累进行,然而随着发展阶段的改变,同时全球产业竞争焦点转向“人才竞争”,中国传统的投资于物的模式面临边际效益递减的困境,单纯依赖物质资本积累已经无法支撑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从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看,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既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关键抓手,又是转换发展动能、培育有效需求的重要手段。

坚持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赋能“中国人经济”发展,需要构建两类投资协同联动的制度体系。首先,推动物质资本投资向支持人力资本积累的领域倾斜,完善教育、医疗、技能培训等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发展。其次,围绕“投资于人”建立全周期的制度保障体系,构建覆盖生育、教育、就业、养老的共同投入机制,引导社会资源合理配置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最后,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一方面强化企业和社会投资中的主体作用,推动企业优化投资结构,另一方面发挥政府在民生领域的投资引领作用,以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撬动社会资本积极参与“投资于人”。

(二)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夯实发展“中国人经济”的产业根基

从各国现代化历程看,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是产业体系的现代化,而在推进产业体系现代化的过程中,盲目追求第三产业比重的提高,过度发展虚拟经济部门,就容易使经济滑向“脱实向虚”,使产业出现泡沫化、空心化,从而损害国家经济安全^[22]。

当前,发达国家纷纷引导“制造业回流”,这进一步反映了先进制造业在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的关键作用。对于中国而言,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受发展环境、发展阶段、发展动力等多方因素交织影响。从发展环境看,在当前地缘政治冲突频繁、全球生产网络系统性重构的背景下,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能够保证中国经济体系运行的安全韧性。从发展阶段看,中国正处于新型工业化加速推进的阶段,必须保持制造业在产业体系中占有合理比重,同时不断发展先进制造业以更好推动“中国人经济”在全球的发展。从发展动力看,先进制造业具有强大的创新溢出与产业链联动效应,能为整个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通用性的先进技术、零部件和关键设备,决定了“中国人经济”的规模与水平。

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首先,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传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压舱石,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重塑传统产业国际竞争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产业体系的增长极,要聚焦“8+9”重点产业构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体系,优化新产业在全球范围的布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其次,要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服务业是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支撑,要深化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同时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最后,要加快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统筹推进传统基础设施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基础设施区域布局,补齐中西部和农村地区设施短板,为“中国人经济”发展筑牢根基。

(三)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和产业链跨境布局,开拓发展“中国人经济”的价值空间

新时代以来,中国货物贸易和双向投资规模持续提升,贸易投资重点向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海外产业布局不断优化,在全球产业布局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23]。面向“十五五”,要继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和跨境产业布局向区域多元化和产业高端化推进,携手各国构建更具韧性的全球经贸网络,开拓发展“中国人经济”的价值空间。

贸易投资一体化已成为当前国际贸易和投资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贸易投资一体化通过深化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实现贸易和投资的双向互动,促进全球资源优化配置。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能够推动商品服务贸易和跨境资本投资有机结合,从而以投资布局带动贸易规模增长和结构优化,以更具韧性的贸易网络引导投资方向,形成二者互促的良性循环。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一方面要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逐步扩大零关税商品范围,优化关税税则结构;另一方面要推动跨境金融开放,持续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优化跨境金融服务网络等。

引导产业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是应对全球产业链重构、增强中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举措。面向“中国人经济”的发展要求,产业链跨境布局要更加强调因地制宜原则,根据东道国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进行差异化产业布局。要加强国内优势产业与重点国家、重点区域的资源对接,在非洲、澳大利亚、拉美国家加强资源类产业投资,在东南亚国家布局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欧美等发达地区推动高技术企业更好“走出去”等。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还要着力提升跨境数智化水平,推动数字技术融入跨境产业链运行的全流程,加强与主要贸易伙伴在数字贸易、数据跨境流动等方面的规则对接。

(四)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构建发展“中国人经济”的伙伴关系网络

利用外资与对外投资是中国开放型经济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以来,中国不断优化外商投资营商环境,为外资企业在华发展提供了新机遇,“投资中国”招牌持续擦亮,向世界共享了中国发展红利。同时,持续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与服务体系,优化对外投资结构,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拓宽了对外投资合作空间,有力促进了东道国经济发展,推动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24]。

在吸引外资方面,要以制度型开放破解外资准入“大门开、小门不开”难题,实现制造业限制清零,扩大电信、医疗、教育等服务业开放试点,保障外资准入准营;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投诉机制与常态化沟通渠道;提升投资服务效能,优化跨境资金流动管理;着力引导外资流向集成电路、新能源装备等先进制造业以及数字经济、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支持外资参与重大

科技项目与产业基础再造工程,鼓励投资绿色低碳领域,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在积极对外投资方面,要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实施更高效的对外投资管理模式,推进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与新兴领域合作文件商议签订;完善海外综合服务,搭建线上线下一站式出海平台,依托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提供融资支持,扩大海外投资保险覆盖面;支持企业通过并购、绿地投资等方式布局全球,聚焦高端制造、新能源、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整合海外能源、技术、人才等稀缺资源,融入全球产供应链;优化对外投资渠道,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合作,引导企业本土化运营、履行社会责任,拓展国际合作朋友圈,提升产业链全球掌控力。

(五)稳步扩大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完善发展“中国人经济”的体制机制

当前,国际竞争的核心正在从“边境上”转向“边境后”,通过降低关税等传统方式已经难以从根本构筑对外开放优势,只有通过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进一步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才能切实增强国际话语权。从对外开放实践看,中国过去的开放以“政策型开放”为主,存在一定的渐进式和倾向性,即开放区域和开放产业的范围逐渐扩大,并倾向于鼓励出口限制进口、鼓励资金流入限制资金流出、给予外资企业更多优惠等。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内外发展环境的变化对对外开放的水平提出更高要求,开放体制需要从“政策型开放”转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

稳步扩大高水平制度型开放,需要从多个维度构建与国际接轨的开放制度体系。首先,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聚焦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金融领域等核心领域,加快国内规则制度适应性调整。其次,扩大自主开放。推动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高水平对外开放,畅通跨境要素流动渠道,以更大力度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依托各类开放平台提升自主开放的质量和效益。最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动参与全球多边贸易体制规则修订与完善,拓展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制度型合作,提升中国在全球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

参考文献:

- [1] 江小涓. 新中国对外开放70年:赋能增长与改革[J]. 管理世界,2019(12):1-16,103,214.
- [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66.
- [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27.
- [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6.
- [5]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82.
- [6] 张辉. 新发展理念引领下我国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J]. 经济研究,2025(9):5-24.
- [7] 王一鸣. 百年大变局、高质量发展与构建新发展格局[J]. 管理世界,2020(12):1-13.
- [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69.
- [9] 韩文龙. 新质生产力的政治经济学阐释[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3):100-115.
- [10] 黄群慧,贺俊.“第三次工业革命”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调整:技术经济范式转变的视角[J]. 中国工业经济,2013(1):5-18.
- [11] 余川江,龚勤林,李宗忠,等. 开放型通道经济发展模式视角下“西部陆海新通道”发展路径研究:基于国内省域分析和国际竞争互补关系分析[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1):65-80.
- [12] 习近平. 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436.
- [13] 裴长洪,刘洪槐. 习近平新时代对外开放思想的经济学分析[J]. 经济研究,2018(2):4-19.
- [14]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484.

- [15] 吴志成. 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理路及其世界意义[J]. 中国社会科学, 2025(10):20-38, 204.
- [16] 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247.
- [17] 马建堂, 赵昌文. 更加自觉用新发展格局理论指导新发展阶段经济工作[J]. 管理世界, 2020(11):1-6, 231.
- [18] 钱学锋, 裴婷. 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理论逻辑与内生动力[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1):14-26.
- [19] 郑飞虎, 曹思未. 跨国公司研发策略部署与开放式创新:来自中国的新发现[J]. 南开经济研究, 2021(4):20-41.
- [20] 陈航, 韩文龙. 人工智能重塑全球生产网络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 求是学刊, 2025(5):76-91.
- [21]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 2025:307-308.
- [22] 李帮喜, 刘充, 陈亮.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实体—虚拟”关系:基于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拓展[J]. 中国社会科学, 2024(12):23-43, 199-200.
- [23] 樊茂清, 黄薇. 基于全球价值链分解的中国贸易产业结构演进研究[J]. 世界经济, 2014(2):50-70.
- [24] 孙楚仁, 张楠, 刘雅莹.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对沿线国家的贸易增长[J]. 国际贸易问题, 2017(2):83-96.

The generation logic,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and practical path of the “Chinese People’s Economy”

Han Wenlong^a, Zhang Ruisheng^a, ZHU Junxi^b

(*a. School of Economics; b. School of Finance,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1130, P. R. China*)

Abstract: The “Chinese People’s Economy” embodies the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philosophy and modernization philosophy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Rooted in Marxist humanistic thought and the world market theory, this concept is both a response to China’s transition from introduce and go global to enter and upgrade, and a practical necessity for advancing the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through higher-level opening-up. Its reconstruction of the accounting system reflects a paradigm shift in national wealth growth. The “Chinese People’s Economy” encompasses profound theoretical connotations: taking people as the most dynamic factor in productive forces as the development subjec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innovation in-depth integration as the development driving force, enhancing people’s well-being and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as the development purpose, expanding development space through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s and resources, and pursuing common creation and sharing of national wealth globally as the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demonstrating a deep-seated, systematic transformation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Not developing in isolation, the “Chinese People’s Economy” is promoted and influenced by the “Chinese Economy”, with both dialectically unified in the global creation of national wealth and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Faced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during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it is necessary to adhere to the close combination of investment in physical capital and human capital, build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with advance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s the backbone,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trade and investment and the cross-border layout of industrial chains, expand the space for two-way investment cooperation, and steadily expand high-level institutional opening-up, exploring practical paths for developing the “Chinese People’s Economy” from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s such as innovation momentum, industrial foundation, value space, partnership network, and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Key words: Chinese People’s Economy; national wealth; high-level opening-up;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责任编辑 傅旭东)